

宗教与当前非传统外交： 理论、战略与机制^{*}

涂怡超

摘 要：20 世纪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宗教复兴改塑了世界格局，集信仰与组织为一体的各类宗教在国际、地区和国内政治中影响不断上升。在全球公民社会深入发展与各类大众媒体争相勃兴的格局中，宗教因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复兴、其跨国性、草根性、议题包容性、目的和手段超宗教性、泛阶层化、组织化与弥散化相结合而重新纳入多国对外战略考量。各国在外交实践中正逐步打破数百年来将宗教边缘化的传统，宗教成为当前非传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重在归纳作为非传统外交资源、手段的宗教在当前多国非传统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机制和政策层面分析当前各国如何运用宗教话语、采纳宗教理念和借助国内外宗教组织形塑大国外交软实力、构建国际话语权、在国际及相关国家游说乃至引导或诱发社会运动；并进而分析其地位、作用与前景。

关键词：宗教对外战略 非传统外交 公共宗教 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5-0023-30

一、全球化、全球宗教复兴与非传统外交的兴起

宗教集信仰与组织为一体，直接或间接地对自早期城邦国家至当代以神权政治为基础的伊朗等各种类型的国家外交发挥深远影响。因宗教冲突历史上祸及全欧，欧洲国家及以欧洲文化为基础的国家长久以来对宗教介入政治领域高度警惕并予以抵制。自 17 世纪以来，威斯特伐利亚范式确立的主权秩序将宗教与外交领域隔离，外交成为一个国家中央政府最高领导人群体与职业外交官的垄断领域。宗教必须服从外交权力逻辑，对外交仅具边缘性影响。^[1]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与全球公民社会的扩展、通讯技术的飞跃和新媒体的发展，外交公开化趋势日益明显。由于国家利益内涵的不断重构、非传统安全议题重要性持续上升，外交议题有扩大趋势。基于此，宗教倚其自身不断更新发展对各国外交施加更大影响。

首先，全球范围的宗教复兴是宗教影响外交的力量之源。全球信教人口、宗教类别、宗教组织的数量均不断扩展。2009 年，全球已有宗教约 11500 种，信教人口达 5905864000 人（同期世界人口为 6828157000 人）。^[2]

其次，宗教在全球的跨领域扩展和整合是宗教影响外交的重要依托。从全球宗教发展迁移的趋势来看，各类宗教中心与边缘不断发生位移并相互交错。第一，当今各类宗教，包括传统世界性宗教和新兴宗教的传播均呈现跨领域延展，已经不断超越国家、种族和阶层等各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督教与当代中美关系”（项目编号：08CZJ065）；上海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美国基督教的全球扩展与‘民主输出’”资助。

种区隔的边界；第二，不断增长的跨国移民亦成为推动宗教跨国化的重要载体，二战以来移民改变了一些国家的宗教版图；第三，一些宗教、宗派或教派组织的中心也在不断发生位移；第四，世界宗教内各宗派内部整合、宗教间对话的持续进行促进了宗教的跨国家、种族和阶层整合。在此情势下，各国国家外交行为的客体往往与各类宗教信仰人群、宗教组织叠合。

最后，宗教在公共领域的多向弥散是宗教影响外交的丰富渠道。在理念层面，各类政治神学、公共神学以神学为基础对政治和社会生活进行诠释和判断。^[3]在组织层面，宗教组织在不断分化和整合，传教组织、以信仰为基础的救援和发展组织、以信仰为基础的倡议及游说组织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公共领域，同时与其他世俗或非世俗组织在公共领域形成紧密程度不一的合作。在议题层面，各类宗教组织对公共领域中出现的各类大小问题一般持有一定立场或原则。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各类组织互动形成各类国际性、地区性、国家性和地方性的议题。在行动层面，宗教组织积极参与治理。在国际和地区层面，众多大型宗教组织积极参与联合国等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事务。在国家 and 地方层面，宗教组织通过公民社会层面的运作影响国家和地方政策制定，并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执行。

由此，当代各国外交若拟在众多领域取得成效，必须面对宗教因素活跃在各领域这一现实。宗教亦为当代非传统外交提供了理念、议题和组织。各国外交对宗教事务或宗教相关议题的处理逐步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极端排斥，转而向古典外交方向有所回撤。

二、理论植入：宗教作为非传统外交资源和途径

（一）宗教与非传统外交理念

当今西方宗教界、学界和政界对宗教返回外交领域的必要性存在共识，认为当代外交往往强调现实主义外交，其理念和实践需借助宗教进行修正，需发挥宗教开辟或运用非传统外交领域以构建和平、维护安全、反恐、推进民主。^[4]在行动理念上，美国多轨外交研究所的戴蒙德和麦克唐纳视宗教为多轨外交体系中的第七轨，认为“宗教是多轨外交体系的良心。它为体系提供精神动力、理想主义和伦理基础。”^[5]道格拉斯·约翰斯顿于2003年提出“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概念，认为对信仰的重视是现实政治的扩展，应该利用各类宗教资源来填平宗教之间的鸿沟、解决宗教冲突，或进行预防性介入。他进一步强调宗教应进行“预防性参与”（preventive engagement）并溶入其实践。^[6]

宗教界和学界亦高度认可由政府主导和资助、宗教组织参与的各类国外救援与发展工作。“将扶贫作为共同目标，并将世界各宗教列入帮助扶贫名单，政府和其他资助方可增进宗教间对话和理解、降低贫困水平，从而防止其成为滋生其它对国际安全威胁的沃壤。”^[7]他们强调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因其信仰核心和全球网络而在从事救援和发展工作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如在防治艾滋病这一重点领域，宗教组织可通过信仰鼓舞与现代科技发挥双向作用。

（二）宗教与非传统外交机制

在机制层面，一些西方学者呼吁降低政教隔离墙高度，倡导将宗教因素直接或间接引入外交领域，加强宗教理念和组织对外交事务的参与，促进外交理念转型和外交机制民主化。对宗教如何不越过现代世俗政治的底线而纳入非传统外交机制，西方学者的路线图要点如下：

1. 确认国际宗教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国际宗教自由不仅关乎正义，更关乎安全，其缺乏会导致恐怖主义与不稳定，其存在则导向稳定的民主、公民社会、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
2. 应借助各种渠道推动各国政府对国际宗教自由政策更为明晰表述，增进有关部门和官员的权限，将宗教自由纳入相应民主计划和项目，从而调拨外援和民主基金给全球将增进宗

教自由作为民主发展一部分的宗教和世俗非政府组织。培育政府各分支掌握世界宗教和宗教自由的知识，促进公共和民间外交机构开展宗教对话和交流，令公共外交更为有效。^[8]

3. 确认宗教可在世界各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发挥修补作用。由此鼓励政府咨询对目标文化和宗教有深刻理解的国内外宗教行动者、宗教组织和学者；鼓励政府在组织国际和平构建、冲突解决、对外救援和发展事务中更多、更有效地利用各类宗教渠道；鼓励宗教组织和行动者合法透过现有正常渠道大力参与多边机制和国际法的形成。

（三）宗教与非传统外交实践

在实践方面，宗教因素对非传统外交的介入主要有两类。

1. 通过各类打通政、俗、教三界的跨国实践推动政策导向。众多思想库和集前政界官员、学者和行动者身份于一身的人物走出国门将宗教因素渗入非传统外交实践。道格拉斯·约翰斯顿创立的宗教与外交国际中心集研究和实践为一体，力图调解因认同差异而产生且传统外交介入无效的冲突，将宗教结合到解决方案中，注重与当地政府、宗教组织和学界展开合作。^[9]全球参与研究所从事宗教与世界事务研究和培训，开展与外国政府的关系外交

（relational diplomacy），促进宗教自由。该所在亚非多个国家协调宗教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并开展教育培训项目。2010年，该所与老挝政府达成正式协议，在促进宗教自由等方面展开合作。^[10]

2. 通过理论研究和政治游说影响政府政策，推动政府开展非传统外交。相关机构和人员借助在教界、社会 and 政界的各类网络和资源，游说本国政府突破对待宗教议题或宗教团体的传统外交模式，同时采取灵活姿态与他国政府和宗教团体、公民社会团体展开接触和合作，介入世界各地的冲突解决及救援与发展。西方有强烈信仰背景的基金会近年来广泛开展全球层面的各类与宗教相关的数据调查，力争统计数据及相应分析形塑世界对相关问题的共识，使其成为各国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2009年，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关于世界各国宗教自由的调查首次将宗教限制分为政府限制和社会限制两大方面。美国及其它一些西方政府对其研究成果予以采信，将其作为强化自身软实力、恶化他国国际形象的工具之一。^[11]

目前西方教界及学界对宗教介入非传统外交的正效应讨论颇多且极富推动实践之热情，对相应环节在执行过程可能中出现的负效应则未加讨论。目前讨论主要的缺失议题有三：

1. 如何掌控宗教介入非传统外交过程中政教隔离墙的高度限制和控制。目前相关理论探讨和实际倡议一般而言主要讨论宗教介入非传统外交对国家及国际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和正效应，对如何以国家法律和政策控制和管理宗教介入非传统外交所研甚少。

2. 如何应对不同宗教组织在理念、组织和机制方面的差异。在不同宗教乃至同一宗教内部推动认知共识困难重重。众多宗教信徒认为，认知共识的形成可能需要一些宗教牺牲其核心信念。不同宗教在组织和机制方面差异甚大，仅从宗教基本理念来讨论宗教在和平构建、冲突解决、救援与发展等方面可作出贡献对主权国家的战略操作而言意义甚微。

3. 国家在通过国内外各类宗教组织达成非传统外交目标的过程中如何达成平衡。如何看待不同的国家、种族、传统和文化背景及其与世界和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结合，这是将各类宗教因素纳入非传统外交必须深入分析的实践基础。

三、实践比较：各国相关机制、政策及效应

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衡量与建构，当今各国对宗教因素外交效应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一) 美国

美国将宗教自由民主和平论与国家安全战略相结合,宗教自由位列人权第一位序,肯定对宗教自由的寻求与美国的核心利益,如推进全球民主化进程、去除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息息相关。美国安全战略的近期走向表明,以宗教自由为由头、以民主和人权为号召通过外交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打压新兴国家发展的态势日趋明朗。由于美国霸权的现实困境,在全球大面积推广民主尚不能成为现阶段美国政府的重中之重。但美国政府认识到仅凭政府之力无法达成对世界各国草根层面的深入影响,非传统外交的政策导向被确立为积极推动多轨外交、借助发展援助和教育培训达成对目的国深入影响,在宗教自由和人权方面采取灵活姿态,以期逐步实现战略意图。美国采取三大途径促使宗教进一步发展为美国非传统外交的重要渠道。

1. 将宗教因素整合进新型外交机制。美国现有外交机制在不断微调以适应当前非传统外交的兴起,形成一体(国际宗教自由法)两翼(国务院宗教自由办公室、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机制。众多国内外宗教组织成为美国评价全球自由的重要消息来源。《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2011年再次修订)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政府将宗教自由纳入外交政策并加以实施所需具备的灵活性,政府可根据各方面综合考量灵活使用这一概念和标准,从而成为美国政府可根据自身战略需要而方便举起和放下的巧实力。宗教自由议题在目前阶段更具公共外交意义。美国利用这一杠杆议题,在损害他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形象的同时为美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形象加分。

2. 将宗教组织整合进入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首先,注重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基督教组织的联动。美国一直高度重视对外援助对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的实效性,外交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整合巧实力,明确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的作用和使命。”^[12]2009年,美国开发总署等政府部门给予基督教救援与发展组织的各项拨款在美国遭受经济危机的阴影下仍继续上升,^[13]为以信仰为基础的美国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更多全球扩展的机遇与空间。美国的宗教组织尤其是基督教组织在组织网络、财力对美国、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的渗透力以及在第三世界的巨大影响力等方面均具有更多的先发优势。第二,美国立法和行政机构日益注重对国内外宗教组织、宗教领袖的直接接触和介入。国务院新进外交官还须经过宗教自由课程集中培训。第三,在对外媒体公关外交中更为注重宗教议题和各国各地宗教组织关心的议题。“美国之音”等媒体对相关情况大量倾向明显的报道体现或透露了美国政府的相应立场和对各国各地宗教、人权组织的道义及实际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政府向相关组织直接喊话的工具之一。

3. 将宗教因素整合进美国中东战略。美国政府透过各类与他国政府和组织的斡旋,以控制资金流向乃至推动修订学校课程安排等方式力促沙特等在伊斯兰世界影响巨大的国家的伊斯兰文化转型,^[14]通过大众公关改善与穆斯林世界关系。奥巴马向穆斯林世界反复申明伊斯兰教就整体而言是促进和平的力量,美国与全世界的穆斯林应在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有‘新开端’”。^[15]同时外交部门注重直接接触穆斯林领袖,以获得相应支持。

(二) 以色列

处于伊斯兰世界之中的以色列长期注重在外交中运用宗教因素以争取其他国家和民众的鼎力支持,增强其联盟和自卫能力。在具体机制方面,在政府高度重视下,外交部和旅游部等部门在宗教公共外交密切合作。以色列注重四大层面的实践:

1. 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巩固深化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联盟。基于基督教锡安主义,以美

国为中心的世界保守福音派无条件支持以色列。以色列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来与美国等多国福音派领袖及组织建立密切关系。政府组织宗教领袖访问以色列，并由总理或内阁成员出面接待，并颁给数位美国福音派领袖最高荣誉奖章；政府支持多个重要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在耶路撒冷建立总部或办公室；以色列总理或外交部长访美时均安排与福音派领导人会晤。借助美国福音派在美国和众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以色列不断扩大世界各国基督教福音派对“建立在《旧约》蓝本之上的以色列”的坚定支持。^[16]

2. 政府注重通过国内外犹太教组织发展与其他宗教组织的关系。以色列首先以国内外犹太教组织为重要中介，发展与全球犹太人组织的关系，注意淡化教派差异、深化旧约纽带和族裔认同；其次，注重强化世界对犹太人悲怆经历的历史记忆，唤起各国民众支持以色列以及国内犹太教团体发展与世界各大宗教的关系；此外，还注重推动高级教牧人员与教宗、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系统的高级教牧人员会晤，缓解以色列与梵蒂冈和基督教自由派之间的紧张关系。

3. 政府推动圣地旅游，尤其注重利用旧约节日进行主题鲜明的宗教聚会，以加强与亚伯拉罕宗教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类朝圣之旅有助于强化众多其他国家公民或其他宗教信仰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支持、进一步淡化以宗教理念为内因的反犹主义。

（三）沙特阿拉伯

沙特地处伊斯兰教发源地和使者穆罕默德诞生地，据有三大圣地之中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国王被称为“两圣地的仆人”。沙特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是成为伊斯兰教之宗主国，借以增强其国家的合法性，成为全世界 14.4 亿穆斯林的精神盟主。自 20 世纪 70 年代，泛伊斯兰主义已成为反抗各类左翼运动、抵制无神论和世俗化影响的重要渠道，获得了沙特巨额资助，并在“9·11”之前得到了西方国家的长期支持。在机制层面，外交部门与朝觐部、财政部等部门密切配合、并与发展基金会等各类半官方部门及非政府组织协调合作。在实践层面的主要举措有：

1. 组建并支持各类国际伊斯兰组织及其下属机构的运作及扩展，主要有穆斯林世界联盟、世界穆斯林大会、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等，其巨额经费主要来自沙特政府。其中，穆斯林世界联盟获得了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磋商地位，在伊斯兰世界具有较大影响力。

2. 筹划安排各类对伊斯兰世界的以宗教为基础的援助。政府大力资助国外修建清真寺、教经学校，资助各类研究所和大学，资助开展各类宗教交流以及进行慈善救助等。通过这些途径传播其瓦哈比伊斯兰教义，对多国的宗教乃至政治思想变迁产生深浅不一的影响。

3. 组织和协调宗教朝觐。麦加朝觐年参加者达数百万之众。沙特设有朝觐部，长期斥巨资维护麦加禁寺和克尔白等。朝觐组织严密且安排妥善，仪式华美壮观，让各国穆斯林感到天下一家和相互平等和睦。同时，政府举办宗教活动、宗教组织会议等多类别衍生产品。

4. 进行跨宗教游说并在世界宣传伊斯兰教的美好形象。沙特亦注重与梵蒂冈、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这类与以色列一定程度上对立的组织开展非正式联系，以此抵消以色列在西方的游说成果。“9·11”以来，沙特政府尤其注重在美国及重要非伊斯兰国家进行公关宣传，力证伊斯兰教并非恐怖主义滋生地，作为伊斯兰精神祖国的沙特在打击恐怖网络方面恪尽职守。

（四）俄罗斯

苏联解体令俄罗斯必须应对国家认同重塑、意识形态领域重新建构的挑战。俄罗斯放弃前苏联时期的普世理念，通过重塑传统实现新兴民族国家认同的重塑，其路线是通过信仰统

合推进国家认同,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俄罗斯的准国教。东正教会则全力支持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积极为俄罗斯的复兴献计献策,在四大版块介入俄罗斯非传统外交。

1. 借助教会纽带保持对信仰东正教的前苏联国家的意识形态影响,协防北约东扩。^[17]

2. 通过俄罗斯东正教会合一改善与海外俄裔的关系。俄罗斯东正教会因苏联革命而分裂,此后海外教会秉持鲜明反苏立场,对海外斯拉夫裔颇有影响。普京执政后采取多种方式推动海内外教会的合一,认为这关乎“国际社会俄罗斯世界的合一,将散落世界数十年的同胞团结在一起”,由此“俄罗斯当局会竭其所能推动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统一。”^[18]俄罗斯东正教会透过频繁邀请深度访问,召开以合一为主题的论坛,颁奖给海外东正教会领袖,不断修改双方能接受的关于历史和现实的措辞推动这一目标。2008年5月,两派正式合一。

3. 通过俄罗斯东正教会扩展俄罗斯在东正教世界的影响。俄罗斯东正教会采取多种途径增进与其他宗主教区的联系,各宗主教区的牧首及各级神职人员通过教会举办的各类活动到访俄罗斯,并将俄罗斯文明与东正教联系在一起,突出教会的普世性。

4. 以东正教为防线,防范其他宗教势力对俄罗斯及其他东正教传统国家的渗透,对抗西方普世主义对俄罗斯及其传统势力范围国家主权的侵蚀。尽管俄罗斯东正教会与罗马教廷关系保持着长期对话与合作,但东正教会坚守核心防线,从教理和教统出发,反对天主教会重构教宗历史上对所有基督宗教教会的职责和作用,明确否认教宗对东方教会的职权。^[19]

(五) 梵蒂冈

梵蒂冈政教合一,各部门均不同程度行使外交职责。其公开外交理念表示以公平和正义为基础维护良知、支持民主、巩固和平、保障人权。其长期外交战略可概括为以大公合一为核心,以宗教的公共性进行统合,树立天主教的普世道德权威地位,推动天主教会成为公民社会重要主体乃至发挥引领作用,同时强化教宗“教会普世牧人”地位,推进教宗角色的集权化与全球化,并恪守教宗无谬误论,采取各类手段控制各地主教任命权,巩固教廷的中心地位。

梵蒂冈在“梵二”会议之后、尤其是若望·保禄二世任教宗后,在公共外交方面有新的突破。

1. 设立专门机构,通过各类对话和互访加深与基督教其他宗派、宗教的联系和对世界宗教的影响。“梵二”会议丰富并打开了天主教与其他宗教、乃至各类无神论者深入对话的渠道。梵蒂冈成为世界宗教对话的重要推动者和核心组织者,有利于形塑梵蒂冈的和平使者形象。

2. 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宗教、社会和政治理念传达普通教友及世界各国的普通公民。自“梵二”会议以来,梵蒂冈尤其注重其在公共领域的道德先知地位,在各类政治和社会主要议题上均形成系统而完整的看法。近年来,梵蒂冈在世界相关重大问题上均充分表明了自身立场,如大力推动千禧年免债计划、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指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其宗教局限,在全球深化了其道德先知地位。梵蒂冈通过教内会议、通谕等方式游说各国信徒支持的主张,形成舆论和政治压力。教宗及梵蒂冈高级官员的频繁出访成为世界及出访国的盛事,受到当地政府、媒体、公民社会组织和教会组织的热情关注。

3. 运用各类新兴和传统媒体进行信息和理念传播。梵蒂冈广播电台运用40种语言对全球听众广播,并通过互联网同时播出。梵蒂冈官方网站有八种语言版本,网站集成各类相关文字、视频和音频信息及时更新。各地天主教会则作为中继站将圣座之声传至教会内外。

结 语

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理念、组织、机制、实践层面介入各国非传统外交，同时成为此类外交的重要目标。当前各国在将宗教因素引入非传统外交时，一般均注重以下原则：

1. 服从于本国最高世俗安全利益及长期发展战略。世俗国家和神权国家对宗教元素的运用均基于对本国安全利益的判断。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意图成为全世界民主和自由的“灯塔”，其战略突出宗教自由，而非任何具体宗教；以色列、沙特因自身宗教传统和地缘局限，必须以具体宗教作为突破口；俄罗斯自苏联解体后重回地区性大国地位，以东正教传统作为苏联意识形态消失后俄罗斯立国信仰之基；梵蒂冈自身的合法性源于天主教及其历史和神学传承。

2. 在全球层面超越具体宗教，努力达成共同基础。在地方层面，根据宗教与地缘的结合确定具体宗教因素的运用。在全球层面，美国以在全球得到高度认可的宗教自由为旗帜；以色列超出犹太教界限，寻求基督宗教同盟；沙特亦注意培育与自由派教会与梵蒂冈的关系；俄罗斯在全球宣传东正教与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关系；梵蒂冈以巩固全球道德先知地位为己任。

3. 具体实施中注重本国教统。美国在采集国外信息、资助救援发展组织时偏重基督教组织；以色列注重发动犹太教及基督教福音派；沙特在全球扶持瓦哈比伊斯兰；俄罗斯借助东正教巩固国家认同、维持对东正教传统国家的影响；梵蒂冈坚定把握对全球天主教会的领导。

然而，主权国家将宗教纳入非传统外交绝非易事，在长期战略、具体政策和深层实践中稍有不慎就弊病丛生。目前各国在宗教纳入非传统外交的理念、战略、机制和实践多层面均在国内外遭至各种批评，乃至破坏国家间外交关系或损害国家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理念与战略的直接和间接负面效应。沙特宗教扩张引起多国高度警觉，认为直接以巨资资助宗教不符合现代国家政教分离原则，“9·11”之后，西方世界对此容忍度急剧下降，认为沙特力推的瓦哈比伊斯兰是国际安全威胁，并获得多方认同。以色列争取基督教福音派同盟的战略在国内外犹太人群体中引起深度忧虑。基于福音派教义，他们认为基督教福音派从长远来说是要消灭犹太人。俄罗斯在新兴国家建设中对东正教的独厚立场亦招致多方诟议。

2. 机制与实践的直接和间接负面效应。宗教自由和平论在机制和实践层面遭到批评。美国对其他国家宗教自由的评判标准、资料来源乃至相关机制设置，以及将宗教自由议题扩散以配合其它战略目标的行为引发了一些外国政府和社会团体的严重不满。在救援发展资金调配方面，美国偏重保守基督教组织的倾向遭到国内外抨击，认为美国替基督教传教和改教打开了大门。西方关注沙特经济、宗教和媒体的扩张，美国国会多次将沙特宗教输出列入遏制议题，在 2003 年达到顶峰。

综上所述，冷战之后，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力量渐强，国家主权在多层次出现让渡，人权概念在不断强化和细分。宗教从观念到组织层面不断谋求参与各级政治的合法性。宗教因素促使外交目标、渠道和影响不断丰富发展，外交行为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对当前主权国家从国际和地方两个层面形成挑战与契机。主权国家应如何扬长避短，如何兼顾全球、国家和地方层面进行考量，如何将中长期世界格局转换纳入长期战略和政策考虑，这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由此，学界需对宗教介入非传统外交的影响和局限继续深入研究。

注释：

[1] Sir Harold Nicolson, *Diplomac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1939, p.50.

[2] David B. Barrett, Todd M. Johnson and Peter F. Crossing, "Christian World Communions: Five Overviews of Global Christianity, AD 1800-2025,"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33(1), p.32.

[3] 各宗教内部均不断进行“处境化思考”，为宗教参与公共领域提供思想依托。如基督宗教内，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提出基督教现实主义，约翰·默里（John C. Murray）将宗教的灵性价值与更新文化、政治和国际秩序相结合，孔汉思（Hans Küng）推研全球伦理，斯塔克豪思（Marx L. Stackhouse）等就公共性日益全球化的处境，探索宗教在当今多元民主政治中的价值。这些在教内外均产生重大影响。

[4] Madeleine Albright, with Bill Woodward, *The Mighty and Almighty: Reflection on America, God and World Affairs*,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6.

[5] [美] 路易丝·戴蒙德、约翰·麦克唐纳著，李永辉等译：《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01 页。

[6] Douglas Johnston, "Faith-Based Diplomacy and Preventive Engagement", in Douglas Johnston ed., *Faith-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lpolitik*, New York: Oxford, 2003, pp.11-32; Douglas M. Johnston, Jr., *Religion, Terror, and Error: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hallenge of Spiritual Engagement*, Santa Barbara: ABC-CLEO, 2011.

[7] J.Paul Martin, Jason Chau and Shruti Patel,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Pluses and Misus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1(1), p. 86.

[8] 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Religion and the Making of U.S. Foreign Policy, *Engaging Religious Communities Abroad: A New Imperative for U.S. Foreign Policy*, Chicago: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10.

[9] Rob Moll, "The Father of Faith-Based Diplomacy: Doug Johnston is going where few foreign policy experts have gone before," *Christianity Today*, 52(9), pp.54-57.

[10] Press release, "IGE's Relational Diplomacy Results in Historic Accord," (2010-4-5)
<http://www.globalengage.org/pressroom/releases/1149-iges-relational-diplomacy-results-in-historic-accord.html>

[11]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at the Istanbul Process for Combating Intolerance and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Religion or Belief," (2011-12-14),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2/178866.htm>

[12] "Quadrennial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Review," <http://www.usaid.gov/policy/qddr/index.html>

[13] 参见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财政年度报告, <http://www.usaid.gov/policy/afr09/USAIDFY2009AFR.pdf>, <http://www.usaid.gov/performance/apr/APR2010-2012.pdf>

[14] Salwa Ismail, "Producing 'Reformed Islam': A Saudi Contribution to the US Projects of Global Governance," Madawi Al-Rasheed ed., *Kingdom without Borders: Saudi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Media Fronti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13-130.

[15] Text, "Obama's Speech in Cairo," (2009-6-4),
<http://www.nytimes.com/2009/06/04/us/politics/04obama.text.html?pagewanted=all>

[16] 内塔尼亚胡前任公关传媒总监认为，“感谢上帝赐予我们基督教锡安主义者。无论对其是否喜欢，美以关系未来对美国犹太人的依赖可能远小于对美国基督徒的依赖。” Michael Freund, "Christian Zionists Key to Continued U.S. Support for Israel," *Jewish Press*, Dec 27, 2006.

[17] News "Ukraine Needs NATO for Protection From Russia-Rebel Patriarch," RIA Novosti, (2008-10-6), <http://en.rian.ru/world/20081006/117474194.html>; News, "Russian Patriarch Urges Orthodox Church Unity," RIA Novosti, (2008-7-27), http://article.wn.com/view/2008/07/27/Russian_Patriarch_urgues_Orthodox_Church_unity/; News, "No contradiction Between Ukrainian Sovereignty, Church Unity-Alexy II," ITAR-TASS, (2008-7-27), <http://www.itar-tass.com/eng/level2.html?NewsID=12902597&PageNum=0>

[18] Putin Congratulates Primate of Russian Church Abroad on his Birthday, ITAR-TASS, (2008-1-1), <http://www.itar-tass.com/eng/level2.html?NewsID=12229648&PageNum=0>; News, "State to promote church Unity: Putin," RIA Novosti, May 27, 2004, <http://en.beta.rian.ru/onlinenews/20040527/39917231.html>

[19] <http://www.bchjh.org/2010/0929/3366.html>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12 年 7 月